

文章编号:1002-980X(2007)09-0094-04

农户土地征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朝华¹, 秦 富²

(1. 中国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 北京 100094; 2.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经所, 北京 100081)

摘要:尝试运用 probit 模型,对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被征土地类型、补偿时限以及对农地的投资这些因素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同方向的变化;被征土地的面积、是否从征地中受益和征地权的决定等因素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反方向的变化。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关注农户的谈判地位、征地权的正确行使、征地范围的划分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来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关键词:土地征用;农户意愿;农民利益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志码:** A

1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农用地资源大量、快速减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截至到 2005 年,全国共有开发区 6015 个,在建或拟建 46 座大学城,已有 306 个高尔夫球场,1 300 万亩优质良田被占用。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仅 2001—2003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累计达 9 100 多亿。尽管 2003 年我国严把土地利用的决策取得了成效,但 2004 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4 年全国耕地净减少 1 200 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已从上年的 1.59 亩降到 1.41 亩;农民失地的严峻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全国人均 GDP 在前九位的省市(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山东省),2004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 203.6 亩,这九省市人均耕地仅为 0.87 亩。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1 世纪我国耕地资源前景分析及保护对策》指出:即使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从 2000 年至 2030 年的 30 年间,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还将超过 5 450 万亩,其中不包括违法征地的情况。到 2030 年,我国将有 1 亿左右的农民失去土地。

中国 1.35 亿公顷耕地的价值达到了 7 000 亿美元,2.1 亿农户应该拥有 5 000~6 000 亿美元的权益^[1],而我国农民真正得到的权益却很少。实际中,多数地方的征地收入分配比例大致是:农民得 10~15%,集体得 25~30%,地方政府得 60~70%。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命根子;农民是弱势群体,失去土地的农民无疑是弱势中的弱势。穷人创造的财富,因为得不到法律承认,所以不能变成资本,这是他们注定要贫困的原因^[2]。征用农民的土地,而农民却得不到属于自己的利益,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首先国家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无法决定土地征用价格。其次,政府具有决定土地征用价格的权力,政府在征地时既是“买方”,又是决定价格的一方,行政权力过大。再次,征地补偿方式单一,主要是货币补偿,没有考虑农民的长远生计和发展;一直到去年 9 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才明确指出在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基础上,加上了“长远生计有保障”。

除了以上制度性的原因之外,我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征地方案中,忽略了对农民征地意愿的考虑;由于土地征用的强制性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目前加强包括土地产权在内的财产权的保护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因此,被征地农民的意愿也应当受到关注。

2 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自从 1998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让 2.1 亿农户对其土地使用权具

收稿日期:2007-04-30

作者简介:王朝华(1968-),女,重庆人,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有安全感(或稳定感);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已成为一大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不可逆转。在1978到2000年间,我国城市从193个增加到663个,镇的数目从2173个增加到20312个,城镇人口从1亿7千万增加到4亿5千6百万,数千万亩的农业用地通过土地征用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据估计,每年有200万农民土地被征用,成为失地农民,也就是要放弃自己使用的土地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对征地的意愿如何,即农民对征地的态度、农民希望在征地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哪些因素影响土地的征用以及农民对征地信息的掌握和了解等;由于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研究不足,为此本人对北京郊区农民进行了关于征地意愿的调查。

北京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日益加快,对土地的需求量也随之扩大,土地征用的现象非常频繁,因此将调查对象选在北京郊县的农户;调查方法是先选择乡,再选择村,然后在村里随机选择调查农户;调查过程中,采取面对面的调查方式,由调查人员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并亲自填写调查表;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50份。

2.2 建立 Probit 回归模型

本文尝试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分析农户是否有参与土地征用的意愿时,由于因变量是0、1二分类变量,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不再存在线性关系,此时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程显然是不合适的。目前研究这类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两个模型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计量经济分析过程中可以相互替代,本文采用Probit模型。

被解释变量用 Y 表示;农户愿意土地被征用,用 $Y=1$ 表示;不愿意则用 $Y=0$ 表示;在调查中发现,愿意土地被征用的农户都愿意以个人名义参与征地谈判。农户是否愿意土地被征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是否有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一技之长、非农就业收益状况、征地补偿金额和补偿方式、来自农业的收益以及对农业的投资等,这些因素以向量 x 来表示,所以有:

$$\text{Prob}(Y=1) = F(\beta'x)$$

$$\text{Prob}(Y=0) = 1 - F(\beta'x)$$

参数 β 反映了 x 变化对农户是否愿意以个人名义参与征地谈判的概率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函数 $F(\beta'x)$ 形式的不同假设就产生了不同的估计模型,Probit模型假设一个正态分布函数,因此有,

$$\text{Prob}(Y=1) = \int_0^{\beta'x} \phi(t) dt$$

用于回归的概率模型为: $E(y/x) = 0 [1 - F(\beta'x)] + 1 [F(\beta'x)]$

与其他的非线性模型一样,该模型的回归系数不能反映影响因素的边际效果,Probit模型的边际效果通过下式获得:

$$y = \frac{\partial E(y/x)}{\partial x} = \left\{ \frac{dF(\beta'x)}{d(\beta'x)} \right\} \beta = \phi(\beta'x) \beta$$

其中, ϕ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β 为待估计的参数, y 为表示边际效果的向量。

解释变量表示影响农户土地征用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组:

第一组:是否有特长(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一技之长)以及特长的主要表现;农户如果具有农业生产方面的特长,可能会缺少土地征用的意愿,因为只有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特长才能得到发挥,一旦离开农业生产,特长将没有用武之地;特长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对农户的征地意愿影响更为直接,相对来讲,如果特长表现在养殖业或花卉、蔬菜等种植业,对农户征地意愿的影响不如特长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因为养殖业对土地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

第二组:包括非农就业收益变量、在本村是否有家庭副业之类的经营活动和在外打工的特征变量;一般说来,非农就业收益较高,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农户就有被征地的意愿,或者说征地对农户的实际生活影响不大;如果征用的土地影响农户的家庭副业活动,农户就不愿意土地被征用,在外打工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一年累计打工时间、从事的工种、培训时间和打工收入,如果打工状况稳定,农户愿意土地被征用;如果打工状况不稳定,土地就成为农户的最后保障,则不愿意土地被征用。

第三组:周边环境,包括离最近公路有多远和附近是否有稳定的工作两个变量;离公路越近的区域,土地被征用的可能性越大;附近有稳定的工作,农户有可能愿意土地被征用,原因很简单,即使土地被征用,仍然有稳定的工作可以提供生活来源。

第四组:征地补偿变量,包括被征土地类型、家中土地全部被征还是部分被征、被征土地面积、实际获得补偿金额、补偿时限、是否有带工补偿是否有医保;农户的农业收入主要来自承包地,农户更愿意自留地被征而不愿意承包地被征,因为自留地对农户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补偿金额接近或

超过农户的预期,有带工补偿和医保,农户就有可能愿意土地被征用。

第五组:该组变量包括来自农业的收益、近 5 年内是否对农业进行投资、投资多少,在来自农业的收益高、打算对农地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农户不愿意土地被征用。

第六组:征地用途变量,主要区分为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公益性用途征地,农户愿意;经营性

用地,即使农户可以从中受益,农户也不愿意,因为土地对农户所提供的安身立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七组:征地权的决定;征地权由国家决定,农户愿意;农户所不愿意的是现实中常见的开发商甚至村干部就能决定征地;最理想的方式是农户能够参与征地的谈判,表达自己的意愿。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边际影响	z	
是否有特长	- 0. 173	- 0. 026	- 0. 85	
非农就业收益	- 1. 64E - 05	- 2. 42E - 06	- 1. 29	
是否有家庭副业	- 0. 595	- 0. 072	- 2. 18	* *
累计打工时间	- 0. 044	- 0. 007	- 1. 85	*
是否接受培训	- 0. 388	- 0. 049	- 1. 66	*
家庭离最近公路距离	- 0. 183	- 0. 027	- 1. 29	
是否有工作	- 0. 734	- 0. 069	- 1. 91	*
被征土地类型虚变量(承包地 = 1)	7. 370	0. 972	6. 02	* *
被征土地类型虚变量(转包地 = 1)	8. 141	0. 999	6. 38	* *
征土地面积	- 0. 423	- 0. 063	- 2. 38	* *
每亩补偿金额	- 2. 80E - 05	- 4. 15E - 06	- 0. 87	
补偿时限	1. 959	0. 290	2. 21	* *
是否带工	0. 902	0. 134	2. 27	* *
金额是多少	0. 018	0. 003	2. 46	* *
是否对农投资	- 0. 464	- 0. 070	- 1. 92	*
投资多少	1. 89E - 04	1. 60E - 05	3. 09	* *
是否受益	1. 591	0. 140	3. 96	* *
是否受益	1. 096	0. 085	2. 31	* *
开发性项目	- 0. 994	- 0. 080	- 2. 01	* *
征地权谁决定虚变量(国家 = 1)	- 2. 751	- 0. 461	- 9. 79	* *
征地权谁决定虚变量(开发商 = 1)	- 2. 011	- 0. 138	- 3. 94	* *
常数项	- 9. 511	-	-	
LR chi2(21)	257. 19			
Prob > chi2	0			
Pseudo R2	0. 5093			

注:*,**分别表示在 0. 1 和 0. 0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指是否从公益性征地项目中受益; 指是否从开发性征地项目中受益。

从估计结果可以表明,农户具有农业生产的特长和非农就业收益两个变量对农户征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从 z 值即可反映,可能是因为农户的特长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例如农户种玉米方面的特长,在改种棉花时可能就表现不出来;至于非农就业收益同样也并不稳定。在本村有家庭副业与农户的征地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能家庭副业收益越高,农户的主要精力越不在土地上,农户对土地的关注越少;家庭一年累计打工时间和接受过培训也与征地意愿呈负相关;离最近公路距离,通过 z 值反映

出其不是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显著变量,原因可能是具备这样条件的农户,外出谋生的机会多,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大,自然也就不主要依靠土地获得收入;附近有稳定工作,与农户的征地意愿呈负相关,这与预期不吻合;被征用的土地属于承包地和转包地的农户征地愿望比较高,与预期相反;被征土地面积越大的农户,越不愿意土地被征用,这部分农户认为被征土地越多,从事农业的机会越少,将会越来越失去土地的保障作用,只有通过农业以外的收入维持生计;每亩补偿金额对农户征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原

因可能是由于补偿金额存在上限,补偿的多少最影响的是农户的短期生活,不能决定农户的长远生计;补偿时限为一次付清、有带工补偿和医保的农户,征地的意愿比较高;近5年内打算对农地进行投资的农户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是否对农地投资,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反方向变化,与预期一致,因为征地与否将影响农户对农地的投资;被征土地属于公益性类型的用地,农户的征地意愿高,因为农户可以从中受益;被征土地用于开发性项目,农户没有征地意愿;征地权由国家或由开发商决定,农户都没有征地的意愿,说明农户自主决定的意识在提高,更加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宜;被征土地类型、补偿时限、带工补偿、医保的数额、对农地的投资以及是否受益,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同方向的变化,其中被征土地类型引起的变化幅度最大,补偿时限其次,引起变化幅度最小的是对农地的投资;在本村是否有家庭副业、家庭一年累计打工时间、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有稳定的工作、被征土地的面积、近5年内是否对农地进行投资、是否从征地中受益和征地权的决定引起农户征地意愿相反方向的变化,征地权的决定引起的变化幅度最大,开发性项目的征地用途其次,引起变化幅度最小的是家庭一年累计打工时间。

从以上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有一些变量与预期估计结果有差异;现实中,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因素多种多样,而且影响因素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同一因素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农户,其影响的方向和变化的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因此,今后对农户征地意愿的研究,还有待于做细致的分类和更深入的探讨。

3 结论和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和启示:

1) 关于农户的谈判地位。从长期来看,包括土地财产权利在内的社会制度安排及其变迁是一个有关利益主体的社会博弈过程,而非取决于单方面的意愿,一个具有谈判优势的利益主体往往在财产权利的界定和利益分配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农户的数量虽然众多,但谈判地位最低。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户基本上成了一个个分散的、独立的单元,从而决定了在与有关利益主体的谈判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还由于单个农户的财产基础薄弱,难以承受产权谈判以及借助法律保护自身财产权利的高昂成本。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加快农民合作组织培育不仅是

市场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是依法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客观要求;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知识和必要性的宣传,以矫正人们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理性。

2) 关于征地权的行使。由于土地征用是典型的公权行为,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种表现,国家要求在征用他人土地时,被征用人应当服从国家需要,对于征用行为没有拒绝的权利;征用属于一种强制性买卖,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在农用地征用中国家与农民集体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应是一种相对平等的民事主体的关系,在征地行为的确定上不具有平等性,但在征地补偿上具有平等性。不能因为土地征用的强制性而忽视农民的意愿;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也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失去土地后,农户更加关注自己的长远生计,仅仅靠补偿是无法解决的,2006年9月下发的《通知》充分反映了被征地农民的心声。目前还应该加强乡村基层干部的形势政策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树立他们依法办事、为民办事的信念,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3) 关于征地的用途。调查中几乎所有农户都一致认为:如果征用土地为了公益性质,可以接受;但经营性的使用,则很不公平,因为农民不能从中受益。既然公共利益的判定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防止征地权的滥用,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鉴国外的经验,清晰地划分征地范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墨西哥、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列举了一个符合公共事业标准的各种用途的详细清单。

4) 关于农民的非农就业。城市化、工业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工作。近些年,各地在探索被征地农民的非农就业安置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创造出了一些模式,比如广东南海模式、湖南长沙模式、江苏昆山模式以及安徽芜湖模式等,每种模式不仅有各自的特点和不足,更重要的是都有一定的适应性,因此在借鉴和引用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针对失去土地农民的引导、服务和安置工作,只有这样,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才能有一个安全的着落。

参考文献

- [1] 罗润国. 土地征用中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EB/OL]. <http://sx.house.sina.com.cn>.

(下转第122页)

Study on Corporat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ZHENG Wen-li

(Management School of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The writer, from macro aspect, has classified Fujian Province's culture into four regional category, i. e., Fuzhou city's culture, South Fujian Province's culture, Putian and Xianyou cities's culture and West Fujian Province's Culture, and made research on developing industry group consistent with regional culture's characteristic. The writer has considered how to form corporate culture matching with different technical status by studying corporate technical innovation background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hases of corporate life cycle from micro aspect in order to seek for corporate culture match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s formation, growing, maturing and declining phases. Finally the writer has proposed to enterprises how to make cultural innovation in a fast chang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 regional culture; corporate culture; technical innovation; life cycle

(上接第 97 页)

[2] 赫尔南多·资本的秘密[M]. 王晓东,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Analysis of Affecting Factors About Farmers Expropriation Will

WANG Zhao-hua¹, QIN Fu²

(1.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2. China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expropriation will, result indicate: land type, compensating limit and investment in land arose expropriation will to change negatively; land area, benefit from expropriation and right of expropriation arose expropriation will change positively.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we should protect farmers' benefit by concerning farmers' negotiating position,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expropriation correctly, allocating expropriation scope, settling off-farm employment.

Key words : land expropriation; farmers' will; farmers' benefit

(上接第 102 页)

The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on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esticide Enterprises

WANG Lin-ping^{1,2}, SHI Chan-juan¹, LIN Qi-ying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CSR is the guideline and principle of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he information tool of gui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 bridge and tie link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rationality, industry focus, weak relativity, maneuverability and typicalit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SR for pesticide enterprise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ts design was consider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novation capacity, product quality, after-sales servic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mployee equity, community relationship and charity activities.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weigh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purposes and indexe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as also introduced then.

Key words :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esticide enterprises; index system; evaluation method;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